

十七世紀中西方接觸中的神話歷史衝突

陳明生著

楊美英譯

對於中國與西方國家的相遇，一般的說法是自「大發現時代」初期起，中國支配了大概由一五一四至一八三九年這首段時期的接觸，而西方國家則於近代的一八三九至一九四三年反過來以一連串不平等條約強加於中國；不過，自一九四三或由一九四九年以後，卻達致一種以主權平等和互利為原則的新關係。

有很多書籍和文章是關於中西方接觸這二段時期的歷史。近期亦出版了數冊為紀念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來華四百週年及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 1623-1688）逝世三百年而舉辦的

國際研討會的重要論文集。（註一）這些書籍為中西方接觸的歷史，特別是利瑪竇和南懷仁的英雄事蹟，引發了新的見解。任何人都可察覺到，當耶穌會在中國明末清初竭力傳揚的基督信仰正得到敬畏和欣賞時，他們的努力亦受到重重的障礙。他們所對抗的，是難以克服而又為當時中國人所信奉的漢族中心主義神話或神話歷史。利瑪竇和南懷仁的成就，在於他們能以實務的態度，把傳教活動與中國實情調和。在這過程中，他們及他們的耶穌會夥伴亦在中國創造了一套歐洲耶穌會神話歷史。這篇論文將反思漢族中心神話歷史與十七世紀中國的歐洲

耶穌會神話歷史的衝突。

芝加哥大學的威廉·邁尼爾（William H. McNeil）教授在文化交流研究上，為我們提供了新的見解。他指出，「神話以人類社會為基礎，」他亦指出，「神話依據信念較之實據為多。」此外，神話歷史對人類行為有極大的影響。（註二）就中國明末清初耶穌會的傳教事業而言，這位作者認為是那些堅持漢族中心神話或神話歷史的士大夫或統治者對歐洲耶穌會神話歷史的抗拒。

一般認為，漢族中心神話或神話歷史蘊含中國乃世界之中心的意念，中國的文明是其他文明的起源，且超越其他文明；「蠻夷」應把他們的生活方式改變為中國的生活方式；中國皇帝乃天子，應被尊為世上其他統治者的宗主國君主，他們更應按已訂的進貢制度派遣使者到中國進貢。這漢族中心神話或神話歷史始自漢朝，並在唐朝進一步強化，再於明、清兩代被統治者加以確定。（註三）由於並沒有其他的國家有能力挑戰這種中國自恃的

優越性，這神話歷史一直被視為現實，直至一八三九至四二年中英鴉片戰爭中，英國決定性地擊敗中國為止。

利瑪竇於一五八三年進入中國時，就受到這漢族中心神話歷史的衝擊。為了免受貢使的制度所制肘，他剛到中國時一直把自己裝扮成一個佛教僧侶。即使經過十七年苦心經營，並與士大夫建立友誼，利瑪竇於一六零一年向皇帝上奏及呈獻禮物時，仍在毫無選擇餘地之下扮演一名來自「大西洋」的進貢使者。由友人所協助草擬的奏疏中，利瑪竇這樣介紹自己：

大西洋陪臣利瑪竇謹奏：為貢獻土物事，臣本國極遠，從來貢獻所不通；遂聞天朝聲教文物，竊語霑被其餘，終身為氓，庶不虛生；用是辭離本國，航海而來，時歷三年，路經八萬餘里，始達廣東……。

伏念堂堂天朝，方且招徠四夷，遂奮志徑趨闕廷，謹以原攜本國土物，所有天帝圖像一幅、

天帝母圖像一幅、天帝經一本、珍珠鑲嵌十字架一座、報時自鳴鐘二架、萬國輿圖一冊、西琴一張等物，陳獻御前。此雖不足為珍，然自極西貢至，差覺異耳，且稍寓野人芹曝之私。

臣從幼慕道，年齒逾艾，初未婚娶，都無繁累，非有幸望。所獻寶像，以祝萬壽，以祈純嘏，佑國安民，實區區之忠悃也。伏祈皇上憐臣誠

慤來歸，將所獻土物，俯賜收納，臣益感皇恩浩蕩，靡所不容，而於遠臣慕義之忱，亦稍申於萬一眼。又臣先於本國忝預科名，已叨祿位，天地圖及度數，探測其秘，制器觀象，考驗日咎，並與中國古法吻合。倘蒙皇上不棄疏微，命臣得盡其愚，披露於至尊於前，斯又區區之大願，然而不敢必也。臣不勝感激待命之至。
(註四)

當利瑪竇獲准留在明朝首都北京後，他被看待爲一名進貢使者，且得到政府定時發放薪俸。作爲利瑪竇的繼承人，其他耶穌會傳教士亦很

有耐性地竭力使中國人皈依基督。一些會士更在明、清朝廷的欽天監內工作，好讓自己以專家或顧問的身份得到尊重和賞識。他們以轉化皇帝信仰基督爲主要目的，但卻經常被難倒，因爲皇帝乃漢族中心神話歷史的支柱。據載，康熙皇帝在造訪北京南郊一處耶穌會會院及小聖堂時，曾經頒下一道諭令，諭令指出：

夫朕所服膺者，堯、舜、周、孔之「道」，所講求者，精一執中之「理」。(註五)

康熙皇帝的諭令反映中國士大夫的一般看法，顯示出作爲中國的統治者康熙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接受教廷對敬孔祭祖禮儀的詮釋。

面對難以克服的漢族中心神話歷史，耶穌會士亦在不知不覺間發展了他們自己的歐洲神話歷史。在利瑪竇一六零二年所著的「坤輿萬國全圖」版本中，他將歐洲描寫成約有三十餘國，全由君主政體統治，不信奉異教，而歸於同一基督教(天主教)之下，基督教崇信一至高之神；歐洲的工匠精巧

明智，歐洲人嫻熟天文哲學。歐人日常生活樸實忠信，重視五倫。歐洲產物豐富，王公大臣富裕健朗。歐洲各國與外國交通頻繁，商旅往來遍行世界。（註六）

同樣，在利瑪竇寫給一名捍衛佛教的中國士大夫的書信中，他再度強調在其家鄉（歐洲），信奉公教已歷一千六百年，歐洲三十多國再無戰禍紛爭，亦歷一千六百多年了。（註七）

這種對歐洲的理想看法也出現在艾儒略（Giulio Aleni）於一六二三年首版的《職方外記》中。

在艾儒略的描述中，所有歐洲邦國，無論大小，上至君主，下至庶民，均信奉天主教，不容存有異端，皇帝慣常只與皇族通婚，且世代生活安泰。貿易與貨物可自由流轉，從未有人爲私行覬覦公物……。

艾儒略也提到，所有在歐洲的公務員，均有豐厚的薪俸，讓他們有充足的方式去支持公益費用，當中亦從沒有貪污行爲。

艾儒略並指出，歐洲國家的稅收是收入的十分之一。稅款由人民自己申報，無需他人追收。司法過程簡單，所有案件均根據事實裁決，不會在未定罪前用刑，法官不能虐待被告。因法律完備，官員不可能剝削人民，也不可能濫用職權謀取私利。（註八）

耶穌會所塑造的歐洲理想景象亦在徐光啓（1562-1633年）的文章中表現出來。徐光啓是中國十七世紀一位傑出的士人夫、科學家和現代化倡議者，也是「基督信仰三大柱石」之一。在他上奏給萬曆皇帝（1573-1620年在位）的奏疏中，他爲一六一六年在南京被鎮壓的耶穌會士辯護道：

蓋彼西洋鄰近三十餘國奉行此教，千數百年以至於今，大小相卹，上下相安，路不拾遺，夜不閉關，其久安長治如此。然猶舉國之人，兢兢業業，惟恐失墜，獲罪於上主。則其法實能使人為善，亦既彰明較著勿矣。（註九）

受到耶穌會士的歐洲神話歷史所影響，徐光啓

認為透過「補益王化，左右儒術，救正佛法者也」，

(註十)天主教信仰能為中國帶來莫大裨益。此外，他讚揚耶穌會士道：

不止蹤跡心事一無可疑，實皆聖賢之徒也。且其道甚正，其守甚嚴，其學甚博，其識甚精，其見甚定，在彼國中亦皆千人之英，萬人之傑。

(註十一)

徐光啓對歐洲所作的辯護和對在中國的耶穌會傳教士所作的評價盡見於這篇奏疏中。一六七六年，他的子孫將這篇奏疏刻在一塊大理石碑上，自此，這更成為中國十五萬天主教徒（相對全國來說仍是極少數）的一篇信仰文章。(註十二)大部份中國人對萬物的秩序仍抱漢族中心主義的觀念。

面對如此頑強而且居於主宰地位的漢族中心神話歷史，利瑪竇及其他耶穌會傳教士只好以務實態度採取調和的措施。由於中國所持的立場由來已久，其他天主教修會所提出的將中國歐洲化的政策，雖然後來得到教宗的支持，最終仍注定歸於失敗。

隨著歐洲於十九世紀在政治和軍事方面日漸強大，以及中國勢力的急遽轉弱，西方國家終於得到機會把漢族中心神話歷史粉碎。

自中國在鴉片戰爭被擊敗後至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中期，歐洲化政策得到全面發揮。中國被不平等條約奴役達整整一個世紀之久。在這裡不可忽略的一點是，自十九世紀中期開始，中國人一直致力為自我及全中國在世界上找尋適當的地位，而重建一套堅實的信念。然而，似乎自一九四九年以來，他們僅僅取得有限的成果。

(註釋見本刊今期英文版頁六。)